

文艺新观

从全新角度表现聂耳的璀璨人生

——吴德铭电影文学剧本《花季聂耳》读后

郑干山



吴德铭教授新近创作的电影故事片文学剧本《花季聂耳》，运用了近几年关于人民音乐家聂耳最新披露的一批历史资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现了聂耳少年时期的璀璨人生。

聂耳的一生非常短暂，除去去世前在日本的一生时间以及在湖南、广州一年不到的从军生涯等（他幼年以及离开云南前曾回过祖居地玉溪加起来大约20天），他23岁半的生命基本上都是在出生地昆明以及上海度过的。聂耳的一生，如果说上海是他“化茧成蝶”的地方，那么，昆明就是他“化蝶”前“为茧成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出生、成长、读书、交游……这18年的生命历程，正是他后来成为早期优秀共产党员和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的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我们关注聂耳之所以成为聂耳非常关键的地方。《花季聂耳》展示的故事，正是以往未过多关注和研究的聂耳生命的这个时期。

《花季聂耳》运用了大量史料，艺术地展现了少年聂耳的成长道路和启蒙教育之源，这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聂耳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歌的作曲者，其实绝不是偶然的，他从少年时期所选择的革命方向和革命道路，应该才是催生《义勇军进行曲》的必要条件。首先，聂耳的革命选择，离不开20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热潮，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震撼世界以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而在云南，“重九”起义、护国运动、“二六”事变、马列主义在云南的传播、中共云南地下党建立、北门街火药大爆炸等，都是聂耳少年时代经历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加上社会现实以及汹涌的革命思潮，直接影响了少年聂耳的人生选择，最终让聂耳成为了一位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说，《义勇军进行曲》是在党的教育引领下诞生的天才音乐作品，其魂魄所系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勇敢精神、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花季聂耳》在探索少年聂耳精神成长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难能可贵。

聂耳去世后，反映聂耳的电影作品也有不少，如于伶等编剧、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的经典电影《聂耳》，王斌编剧的《少年聂耳》以及青山编剧、导演的《为国而歌》等等，由于诸多的原因，这些电影作品以赵丹版《聂耳》以及青山编导的《为国而歌》为代表，艺

术塑造了聂耳的银幕形象，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但这些作品主要以成年以后的聂耳为对象，对于少年聂耳时期的思维形成与发展的表现或缺失，或不免失于概念化、简单化，这对于宣传聂耳，宣传国歌，总是一种遗憾，吴德铭的《花季聂耳》对此可以说是填补了一段空白。

《花季聂耳》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少年聂耳走向革命道路的必然性。聂耳出生于普通平民家庭，生活的艰辛和底层人民的生活让他从小就萌发着革命的激情，他向往革命，同情劳苦大众，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积极接受五四新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喜欢《马赛曲》和法国大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李国柱、李生庄、郭耀辰、甘汝松等交游，学习，与张天虚成为莫逆之交，对老师、云南早期共产党员赵琴仙的被害义愤填膺并积极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扣，聂耳的革命道路与云南昆明紧密相关，这正是《花季聂耳》要告诉我们的。围绕少年聂耳，《花季聂耳》还刻画了一批云南早期共产党员的“少年战士”，他们与聂耳一起绽放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红色花季”！

《花季聂耳》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它揭示了聂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聂耳生活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依然是学校的主流，而聂耳从小就经过中华童蒙教育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少年聂耳身上，其实也饱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聂耳对于母亲，对于哥哥、姐姐，恪守孝悌之道，这在现存的聂耳日记与书信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聂耳尊重师长，这从他对赵琴仙烈士以及省师段老师的关注和帮助中，可见端倪；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地方文化的热爱，戏曲、花灯、洞经音乐、地方山歌与民谣等等，结合对昆明地方文化影响甚深的法国文化，聂耳早期的音乐活动（如与张庚侯、柏希文、林之音、周霖、桂涛声等的交往以及中学时期参加演剧、音乐会等等）和文学活动（他的文学天赋也非常高，这在他早期的文学创作和日记中可以感受到），已经为他日后的辉煌人生做好了准备。《花季聂耳》对少年聂耳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花费了不少的笔墨，这样的安排是合理并且应该的。

《花季聂耳》里有众多的关于党领导学潮的画面，这是非常严肃的事，不能靠想象。剧本中，聂耳与李鑫、李国柱、吴澄、艾思奇、陆万美、张天虚、袁春晖、聂叙伦等一起带头走上街头的景象，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当年中共云南地下党特别支部成立以及临时省委成立都是在秘密情况下以秘密身份活动和进行的，怎么可能连特支书记、地下党领导都大摇大摆地带走在游行队伍中呢？聂耳作为一名中学生，没有材料表明他直接与李鑫、李国柱、吴澄、王德三等云南地下党领导一起活动，仅仅是作为省立一中老师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国柱经人介绍与他见过一面，对他这位进步青年给予了鼓励。此外，剧本中大量的活动场所安排于成春堂也

是不合理的，成春堂只是一个中药铺面，与聂耳家的居所并不是一个地方（现在的成春堂，聂耳只是出生到一岁时住过，其童年、少年时期主要居住在威远街，端仕街一带），这些场景注明“聂耳家”可能较为合适。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聂耳在昆明时期与艾思奇、陆万美有更深的接触，所谓聂、艾在聂耳离昆前游西山的场景应该并不存在，现有材料表明，聂耳与张天虚在昆明接触较多，与张庚侯、廖伯民、郑易里、李庚若、陶汝泽、许强、周霖、桂涛声、李家珍等接触更多，为什么不以这些素材来组织画面和故事呢？在少年时期，对聂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是二哥聂子明（可以从现存聂耳书信中看到），但为什么《花季聂耳》中几乎见不到这位“聂二哥”呢？甘汝松是聂耳的同学，他与马登云、秦美、李兴源等“八烈士”因揭露昆明北门街爆炸案而被杀害，另外，还有在昆明牺牲最早的革命小英雄梁元斌，如果把他们与聂耳共同进行革命活动作为故事元素来呈现，也许比用艾思奇、陆万美、聂叙伦等来表现，要更具合理性，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剧中对聂耳拜访“经济特区”袁嘉谷以及在袁春晖闻房里活动的场景，也是比较可疑的。袁春晖的父亲是袁嘉谷的侄子，1921年去世（当时袁春晖仅8岁），一个四十五岁小女孩不太可能随便引荐聂耳去拜访爷爷辈的袁嘉谷，而且由于门第悬殊，聂耳与袁春晖交往，袁家是一直反对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交游、初恋，不可能出现聂耳跑到袁春晖闻房去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事。他们喜欢去的玫瑰花田在昆明西坝（张天虚有专文记录），不是剧中写的安宁；剧中引用的聂耳写给袁春晖的那首诗（“记得你是一朵纯洁的白兰……”）是几年后的1932年写于上海的，怎么会几年前就跑到昆明“成春堂”写出来呢？另外，“艾思奇”这个名字也是李生萱后来为撰写和宣传马克思与列宁党的笔名（爱马克思与伊里奇的意思），剧本中一开始用，是否太“穿越”了？这些都属于硬伤。

但瑕不掩瑜。《花季聂耳》毕竟开拓了一块表现聂耳伟大一生的新表现领域，这对研究聂耳、宣传聂耳，非常有意义，真诚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挖掘与表现“少年聂耳”这块“富矿”，让党的优秀儿子、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深入人心！

新书推荐

千古风流笺里观

——《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读后

黄东光

《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现代出版社2022年3月版）是80后作家、影视编剧成长的最新力作。这本视角独特的历史读物，旨在用书信作为载体，在捕捉历史细节的同时，亦将三国时期那段惊心动魄的风云突变，以及众多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一面，生动呈现出来。

历史是一面鲜活的镜子，而书信则是历史的有力见证。距今1800年前的三国时期，刘备、孙权、曹操、诸葛亮等历史人物，围绕着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复杂争斗，可谓各显其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那段前后60年的乱世之中，无论君臣、父子、同僚、友人、对手之间都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书信的字里行间往往暗藏着微妙的心理博弈，信简的背后则往往是一段传奇往事的缩影。透过这些书信，可以管中窥豹地洞悉三国那段历史。成长从史料中逐步梳理出47封三国人物之间的通信，通过他们的鸿雁传书，以及笔墨交锋，生动映照出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形象。刘备的以德服人，孙权的崇尚礼仪，曹操的谲诈奸猾，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透过那些长笺短帛，无不一真实地坦露开来。

这些形式不拘、内容多样的书信，涵盖诫子书、交友书、奏书、战书、绝交书等。有的用词委婉谦和，体现出写信者深厚品德修养。有的情真意切，笔墨流畅中见足见书者很高的文学造诣。有的快言快语，嬉笑怒骂中尽显主人的真性情。有的用语深刻，寄寓着写信人浓缩的思想意蕴。品读这些微泛黄的历史书信，读者在见字如面中，不仅可以揣摩提笔者性情、心境和性格，还能从他们你来我往的纸面交锋中，拂去历史的厚重烟尘，于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的岁月回响中，充分领略到精彩纷呈、暗流涌动的三国博弈。这些无声的逐鹿，大到安邦治国、整肃朝政，小到读书立志、修身养性，一封封个性鲜明的书信，在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中，深切地表达着写信者的真知灼见，为我们还原历史往昔，追溯相关历史细节，提供了难得的“活

教材”。鉴于此，成长将这些书信细心梳理，写成了十一个相互独立的故事篇章。其中既有我们广为熟知的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也有普罗大众不太熟悉的曹植《求自试表》、曹丕《与吴质书》、王朗《与许文休书》等，成长以这些书信作为叙事脉络，为我们逐一描摹出一个充满了智慧与谋略的三国新形象：好勇斗狠的袁绍、袁术兄弟，如何借力谋夺天下；一代奸雄曹操与老谋深算的孙权，如何在20年对峙中惺惺相惜；一向以仁义为重的刘备，如何为了全取益州不惜“拔发入山”；以及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如何通过书信在上庸制造了一场“谍战风云”等等。

这些流传至今的书信，有的还进一步展现出中国古人崇善尚德的美好人性。品鉴《陈情表》，字字珠玑中，不觉被李密一颗诚心所打动，情真意切的文字，将李密不慕权贵，一心孝奉母亲的尊老、敬老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为之动情。诸葛亮的《诫子书》更是以深长的意蕴，为后人留下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样的千古名句，为我们正确处理好读书与修身、干事与创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精神标杆。这些彰显美好人性，体现至纯道德追求的书笺短简，处处凸显出古人的处世智慧，也让我们看到，三国谋略，不仅体现在治国理政上，还深入触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是读不完的英雄故事，品不够的三国智慧。

三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千古风流笺里观。《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以书信作为切入，解剖着历史，还原着真相。作为一本大众读物，本书除了讲述书信背后的故事，还将书信原文附在正文之后，并配以白话译文与典故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这些出自三国人物亲笔写下的文字，从而循着这些纸短意长的书信甬道，穿越到遥远的三国时代，让那些流传千古的英雄故事和动人传说，越来越清晰地镌刻在我们的心间。

云岭阅读

努力耕耘在自己的创作根据地

——读黄晓萍长卷文化散文《哀牢山的呼吸》

苏轼冰

阅读黄晓萍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长卷文化散文《哀牢山的呼吸》，想到了作家与创作根据地的问题。作家要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这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经验。然而，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话题才重新又热起来。

创作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独有的领域，诸如鲁迅先生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史铁生的地坛、贾平凹的商州、余华的江南水廊、池莉的武汉、迟子建的白桦村、叶广芩的东北北京生活、方方的小荆楚、王安忆的大上海、莫言的山东高密乡……福克纳说：“我一生都在写邮票一样大的地方。”每一个作家只有选准自己的创作根据地，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和人群写深写透，才能写出真正动人的作品。一生写一个地方，就能写出真正的感情，写出深度。写一个领域也一样，如刘庆邦一生写煤矿，写成了写煤矿题材的大家；沈石溪一生写动物小说，作品不但在儿童文学领域连年获奖，还使他获得了中国乃至世界动物小说大王的美誉。

黄晓萍是用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和领域的，也是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种创作“自觉”的作家。她的创作根据地是山，她大半生活和赖以生存的千里彝山，她的创作领域是大山的历史文化和那里的人们。

黄晓萍就是这样，十五六岁作为“支边青年”，被从四川重庆一下子甩到了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哀牢山深处的林场，伐木、挖路、当“火头军”煮饭，人生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她一辈子记忆深刻，一辈子为之奋斗——她创作开始就一直写彝山。

从她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所写的散文，到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散文选刊》等诸多报刊上的散文，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山狗吠月》以及后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影视文学、纪实文学，除了长篇纪实《真爱长歌》之外，黄晓萍的所有创作几乎都是有生有事，人物带故事，故事中有人物，读起来有血有肉，感人至深。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各章既自成章节，又相互贯

通，浑然一体。书中所写的人物、史料真实，考据充分，行文流畅优美，完全体现了黄晓萍一贯的写作风格和她自成一家的散文功力，可以作为散文读，又可以作为纪实文学读，还可以作为民族文化资料读。

黄晓萍在她的《后记》里说：“楚雄州是我的衣食父母，哀牢山中处处有家。”“本书中，我写了哀牢山和我们，也写了哀牢山和我，看似悠闲，其实沉重。”是的，黄晓萍的根在彝山，创作“根据地”在彝山，写哀牢山就是写她自己的故土，写哀牢山就是写她自己的“家”，写哀牢山的人就是写她自己。

《哀牢山的呼吸》不像很多所谓的“文化大散文”那样，多“纪实”而少“文学”。黄晓萍的文字优美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她带着感情去写的，是自觉自愿地去写的。当然，作为历史文化大散文，光有这些还不够，还得看它能否真正写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品位和历史文化内涵，写出不同一般的历史文化价值。

双柏是一个历史文化厚重、民族文化多样的山区小县。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置益州郡时为24县之一。发源于此的彝族创世史诗《查姆》和以彝族“老虎笙”“大锣笙”“小豹子笙”为代表的彝族民间文化以及“阿塞调”“阿乖老”“冷气腔”“四季长腔”等彝族民间音乐多年来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写过很多文章，拍过不少影视片。但黄晓萍的《哀牢山的呼吸》与以往不同，她写的是不介绍，不是从资料到资料的抄传。她写的是自己50年来的青春记忆。

几个月中，她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访问过去的当事人，追寻过去的踪迹，走遍了双柏的大部分乡镇，采访了熟悉双柏民族文化等诸多人士，通读了与双柏民族文化有关的大量资料，把自己关在楚雄的屋子里两个多月，写出了22万字的《哀牢山的呼吸》，并很快得到选题十分严谨的吉林文史出版社的青睐，将此书出版发行。

阅读心得

沉浸式感受阅读

沈远婷

4月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第27个“世界读书日”。网络化的时代，阅读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快餐式阅读”也伴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而兴起，不禁让人思考，阅读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的小时候，网络都是2G，没有电子阅读，也没有铺天盖地的视频宣传书本片段，那个时候在书店里找到一本开封的书，读起来，就可以完全沉浸其中，书中的主角仿佛就是我自己，我找到了一把打开平行时空的钥匙。

我完全沉浸其中，我也是个性情中人，随着跌宕起伏的剧情，或悲或喜或怒，将书中人物的三观转移到自己身上，在书中的江湖里行侠仗义，在书中的朝堂之上开科举，在书中的战场上与红军共进退。

作为一个普通人，并没有那么多精彩的剧情可以遇见，但是在书里，我有千百个模样，我用一个读者的视角，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在性格古怪不愛交流的日子里，阅读陪伴我很多日夜。

我的大部分认知来源阅读，读书时从孔融让梨到朱自清散文《赤壁赋》，工作后看《舞姬》《烟与镜》，但是以往看过的书，我能记住的内容寥寥，不刻意背诵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总能无意间说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抑或为了让自己的论点立得住，引经据典。这些我看过的书成为了我潜意识里的认知，帮助我建立框架，开阔我的眼界。

我读《烟与镜》时，觉得很有意思，尼尔·盖曼在前言里将为什么会写每个故事的缘由一一道来，一时灵感，编辑要我求，为了某位不知名的朋友。我想，他很爱惜他的每一个故事，用纸做载体，将他的所感所惑，天马行空装了进去。

我从未想过一篇故事的发生会是这么简单的原因，人物原来可以这么描写，他像是站在阳台上，阳台里的房子装着他这个世界的感知，阳台外装着他的天马行空，通过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阳台让他与这个世界有了一个联系，作为他的输出点。

书籍将常人的生活写成故事，将大家从未经历的时代，不了解的现在，猜想的未来通过写实、叙事、幻想写成故事，而不同的作者又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对外输出着自己的观点，写出大家看不见或想不到的盲点。

我与朋友聊天，工作后，一直在不断地输出，慢慢地感受到了力不从心，开始悔恨没有好好读书，这个读书与学历无关，是来源于知识的匮乏。

脱离学校后，系统的学习几乎没有了，工作就是啃老本，将榨干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不如意，就会很焦虑，读书输在了自己贪玩，工作输在了自己没有好好读书。

我把《精进写作》看完，依然焦虑，觉得没有太大的用处，花了几夜时间看了一本没用的书，后来不断地翻看类似《中国新闻采访写作》的书籍，发现阅读一本本书的时候，你要自己没有收获。

你静下心来去阅读一本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一处黑暗的地方找到了光源，在干涸的地方找到了水源，可以去认真地思考，慢下来感受。

读过的书会通过积累，从一个点变成两个点，慢慢地就有了一根线，自己串联，形成一个网络，盘踞在你的身体里，通过你的行为举止，在你的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来。浸染过书香的人，骨头里都是那股味。

读书越多，对一个句子或者是词语的理解就越深刻，不再是从表面去看它的意思，就像许多小时候不理解的书，现在回过头去看，就能明白当时没看懂的地方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有的人觉得读书无用，记不住也不理解，通篇看下来，没有可以帮助到自己的地方。殊不知，书是走捷径的渠道，看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了脑海深处的记忆，一点一点地帮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新书架

《方树梅藏民国文士手札集》出版

由赵天华编著的《方树梅藏民国文士手札集》近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云南著名文献学家、藏书家方树梅先生所收藏书信、手札、题签等文献的整理校订，共收录如马一浮、顾颉刚、朱师辙、刘文典、柳诒徵、姜亮夫、蔡哲甫、丁惟、李根源、袁嘉谷、楚图南等169位近现代名贤文士的书信、手札500余通，其中多数为首次公开面世。

《方树梅藏民国文士手札集》书信、手札、题签等的书写时间几乎贯穿了整个民国时代，手札记录了当年文士们的生活和思想变迁，亦记录了他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脉的坚守、传承及家国情怀，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文人雅士间的故纸遗墨，从细节上了解云南近代史中一些文化与社会变迁弥足珍贵的民间记忆。

郑干山